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态文化创新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

张佑林¹ 田骥铭²

(1. 南方科技大学 全球城市文明典范研究院, 广东 深圳 518055;

2.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经济史系, 伦敦 WC2A 2AE)

[摘要] 中华民族在长期文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生态智慧与文化传统,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根脉。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在辨析生态文明与生态文化内涵及界定其关系的基础上,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开历史溯源,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划分为农耕生态文化、草原生态文化、民俗生态文化、宗教生态文化和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五种基本类型。进而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需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发展赋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路径展开深入探讨。研究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永续发展等生态哲学理念,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发展,完善生态文化价值理念,对于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生态文化;生态文明;传统生态文化;生态文化创新;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 TP39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699(2026)02-0075-11

一、引言

2014 年 9 月 24 日,习近平主席在纪念孔子诞辰 256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指出,“世界上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比如,关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关于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①。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文明以其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而独具特色,其中积淀深厚的生态智慧与文化理念,如同一股永不枯竭的清泉,滋养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也为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宝贵的东方视角。从“天人合一”的整体宇宙观,到“道法自然”的哲学根基;从“仁民爱物”的伦理情怀,到“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实践智慧;从“四时有序、万物有灵”的朴素认知,到因地制宜、和谐共生的生态实践,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着极其丰富且跨越时代的生态思想资源。这些思想不仅塑造了古代中国“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的景观风貌,更深深烙印在民族的精神基因之中,成为我们回应生态问题、追求永续发展的文化原点。如何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座“富矿”,推动其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使之与当代生态科学、绿色发展理念相融合,与现代化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

[收稿日期] 2026-01-16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研究重大专项(24VWB027);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2025 年度项目(GD25CYS61)

[作者简介] 张佑林(1964—),男,湖南永顺人,南方科技大学全球城市文明典范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

^①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 256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6 页。

相衔接,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注入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文化凝聚力,成为一项具有重大理论与现实意义的时代课题。基于上述背景与关切,本文立足生态文明与生态文化辩证统一的理论视角,首先,对生态文明与生态文化的内涵及其关系进行辨析;其次,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态文化的主要类型加以梳理,并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需求,分析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态文化创新发展的必要性;最后,从观念更新、制度建构等方面,探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实现路径,为生态文明研究提供文化层面的理论参考。

二、生态文明与生态文化的内涵辨析与辩证统一关系

(一)生态文明的内涵

“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生态文明可定义为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客观规律的物质、精神财富总和^①,它是人类反思工业文明而形成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社会共同发展的新阶段文明形态。相对于“野蛮”而言的生态文明,标志着文明在观念、路径、模式革新等方面所取得的重大进展,具有系统性、可持续性、和谐性与人本性。第一,系统性。生态文明是一种系统思维方式,既着眼于人类在空间上享有良好的生活环境,也强调人类在时间上使用自然资源的平等权益,更关注人类社会全面发展的长远利益。第二,可持续性。生态文明的基本原则是可持续发展,对生态文明的建设,就要求人类在从事物质生产和消费活动的过程中,不能只限于自身的物质、精神享受,还应该充分考虑资源环境承载力,保证生态、经济与社会三大效益的均衡与统一。第三,和谐性。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程度决定着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重视生态保护工作,协调城乡生态环境良性互动发展,缩小地域间生态设施差异,坚定不移地走文明发展之路。第四,人本性。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形态进行批判时提出的概念,既包含人与自然关系中的物本属性和人本主义思想,又蕴含丰富而深刻的哲学内涵。它强调人类的自觉和自律,其着力点在于引导人类社会走上持续和谐的发展道路,最终归宿是实现人类社会的永续发展,发展人文精神、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则是建设生态文明的最终目标。

(二)生态文化的内涵

生态文化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发展的文化,以对自然环境、生态平衡及人类生存发展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价值观体系为特征。因此,它既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产物,又反映了现代文明进程的基本趋向,是先进的、绿色的、和谐的文化。生态文化观念由“人类支配自然”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转换,是人类价值观念的根本性变革,而这一变革又在更深层次上促进了人类中心主义向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新的价值导向的转变。在学理上,生态文化主要包括生态精神文化、生态制度文化和生态物质文化三大类型。“生态精神文化”是指人类关于自然的思想观念体系,它包括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基本信念及相应的行为规范,是对生态环境进行有效保护的思想基础。作为一种观念文化,生态文化在日常生活中指导人的行为活动,是行为主体固有的价值约束。“生态制度文化”是从体制层面出发,负载生态保护观念,以调节公众行为和宣传生态保护观念为主的各种约束性法律法规及政策纪律的统称,是进行生态保护的外在约束。“生态物质文化”是现实中存在的具有生态理念的物质实体,例如,有机农业、绿色产品、绿色建材等。这些物质实体在生产和消费的各个环节中,都肩负着传播生态文化意蕴的重要任务。生态文化的广泛普及必须以公民价值观念、行为准

^① 李娟:《人工智能时代的生态文明整体性重构》,《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1期,第17-26页。

则及具体规范的转变为基础。

(三)生态文明与生态文化的辩证统一关系

从唯物辩证法的眼光来看,生态文明和生态文化是相互联系的矛盾统一体,且这一联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从价值层面上看,两者都包含着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绿色生活、可持续发展等理念。从内涵上看,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形态,是物质与精神成果之和,生态文化则是包含风俗、语言、人文艺术、价值观念等在内的,各种精神文明及其对人类活动所产生影响的总和。在对“增长极限”深刻反省与环保主义日益兴起的当今时代,生态文化正逐步成为人类共同的意识和价值理念,生态文明则是在以生态理念为基础所派生的多种理论指导下,形成的一种具有高效、公正与和谐特征的社会文明形态。

生态文化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源泉动力,没有生态文化,生态文明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第一,生态文化是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生态文化树立起“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①的自然观,摆脱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功利性思维,以满足子孙后代的生态需要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在长期的实践生产生活中形成自己独特的主旨内涵,为生态文明提供正确的价值观指导。第二,生态文化为生态文明构建良好社会环境。生态文化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核心,以尊重和维护自然为价值取向,对生态环境问题进行深刻剖析并提出科学解决方案,这些方案长期以社会制度的形式存在并发挥作用。第三,生态文化为生态文明提供精神支撑。生态文化以其丰富的思想内涵和独特的思维方式,使人们深化和升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为生态文明奠定良好的思想基础。生态文化是生态保护的重要内容和手段,其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与生态实践形成生态文化制度规约,能够提高人们的生态文明自觉性,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文明是生态文化发展的题中应有之意,没有生态文明,生态文化就成了水中之月、镜中之花。第一,生态文明是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高度概括和总结。它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本出发点,以制定科学的生态政策为基础,以生态教育为核心主旨,以推进生态民主进程为重要手段,以构建良好的政治生态文明为根本宗旨,以实施有效的管理为保证,形成有利于生态文明发展的制度保障,是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系统工程。第二,从理论层面上看,生态文明是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核心的生态文化构建,能够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它发展为包含生态民主、生态福利、生态正义等理念与制度的新型社会形态,是生态文化在文明社会中的集中体现。第三,生态文明是对传统人与自然关系认识的升华,以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价值目标。它强调人的自觉与自律,追求以人为核心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公正和谐,把人从物质财富的单一追求桎梏中解救出来,面向更高层面的精神生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生态文明与生态文化互为条件、前提和基础,共同构成了两者互动发展的主要路径。生态文明建设要以生态文化为指导,摒弃传统的高能耗、高污染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倡导绿色环保、集约型经济,改变以往仅依靠政府进行生态治理的单一主体模式,形成多元利益主体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的协同合作局面。生态文明的生态型生产和生活思维模式也符合当代生态文化观的理念,主张坚定不移地走人口合理增长和自然资源可持续发展之路。建设生态文明就是要推进生态文化进程,二者之间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①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7页。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态文化的多元形态及其创新必要性分析

(一)生态文化的多元形态

中国传统生态文化蕴含着丰富的尊重自然、永续发展理念,是现代生态文明的哲学渊源。^①以大河流域作为文明起源的中华民族,发展出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多元文明形态,在历史洪流中的中华农耕文明不断吸收、内化外来文化,逐步发展成为受儒家“天人合一”本体思想、佛家“珍爱生命”博爱意识、道家“道法自然”伦理价值与马克思主义生态文化思想影响,兼收并蓄、涵盖面广的中国特色生态文化。从具体形态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态文化并非单一结构,而是呈现出多元并存、因地制宜的发展样态,具体可分为农耕生态文化、草原生态文化、民俗生态文化、宗教生态文化和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五种基本类型。

农耕生态文化是在长期农业生产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总体表现为“顺应天时”的农业发展观。古人受雨热同期的季风气候影响,“靠天吃饭”“顺天时、量地力”的农业文明极其关注自然环境变化,创造出二十四节气以及“秋分不割,霜打风磨”等农业谚语。《齐民要术》《天工开物》《汜胜之书》《农政全书》等农业著作中也阐述了因地制宜、废弃物循环利用、顺应天时的农耕生态思想。现代社会在传统农业生态观的基础上提出的生态农业理念,既继承了传统农业的优秀经验,又运用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鼓励农村经济与生态协同发展。

草原生态文化根植于草原游牧民族特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因之而生的“长生天”文化以及“万物有灵”“天人合一”“敬畏天地”的思想,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作为观念领域与实践生活的价值尺度与行为准则,形成了强调生态平衡、反对掠夺式开发的生存智慧,这对草原地区发展以畜牧业为主的经济有着重要作用。畜牧业发展从工业化生产转向生态化生产,就是草原生态文化在现代条件下的重要体现。

民俗生态文化是在我国辽阔地域、多样气候类型和复杂历史演进过程中逐渐生成的,既是人们认识自然、适应环境的智慧结晶,也是长期生产实践的深厚积淀。从精神世界来看,民俗生态文化多以信仰、占卜、祭祀的方式表现出来。从物质世界来看,人在处理与自然的关系时的能动性体现在环境选择上;以房屋建筑为例,几乎每个地区都有着适应当地环境的独特建筑类型,无不反映了因地制宜、顺应自然的生态环境选择思想,将民俗生态文化内嵌于日常生活之中。

宗教生态文化起源于人类对自然力量的敬畏与崇拜^②,要求人类遵循自然发展规律。其同样对中国的生态思想产生了一定影响。

少数民族生态文化源于少数民族在特定自然环境中形成的多样化生态适应模式,他们在远离主流文化的地方集聚而居,衍生出风格各异的生态文化,通过世代相传的生产生活方式维系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例如,壮族因稻作而生的“那文化”,强调森林、水源、人类、天地等的守恒法则;藏族认为人与自然的血缘关系;蒙古族相信万物有灵,敬天畏地;维吾尔族“逐水草而居”的绿洲意识与冬夏放牧的转场行为,确保了草原与水源的生生不息。这些均蕴含着顺应自然的哲学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态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现代社会也同样发挥着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作用。

包括农耕生态文化、草原生态文化、民俗生态文化、宗教生态文化和少数民族生态文化在内的

① 李娟:《中华传统生态文化与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内在契合的三重维度》,《科学社会主义》2024年第2期,第77-84页。

② 曾传辉:《论马克思主义宗教生态文化观的几个问题》,《世界宗教文化》2021年第1期,第10-19页。

中华民族生态文化,发展至现代,都不是一步到位,而是在历史长河中长期积累完善、不断创新。其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痛苦的教训。究其缘由,是生存的需要、发展的需要,更是交流融合的需要,反映了人类对生存与发展、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认知在不断深化。对生存与发展的追求、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探索,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生态文化创新的内生动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则是这种文化创新的必然结果。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态文化创新发展的必要性分析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将人类历史发展的整体进程划分为“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性”“个人全面发展”三个阶段,分别体现了人类自我实现的不同程度^①。这一划分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揭示了人类社会从以依附关系为主导的“前文明形态”,走向以物质为主导的“内在分裂的文明形态”,并最终发展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文明形态”的内在逻辑。当前,人类社会正处于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的关键阶段,在这一进程中,生态文化在协调人与自然关系中的基础性作用日益凸显。由此,在我国社会发展新时期,在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推动生态文化的创新发展,对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满足人民需求,解决我国生态工程建设问题

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写道:“在人人都必须劳动的条件下,人人也都将同等地、愈益丰富地得到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所需的资料。”^②这一论述表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需求将由单一的物质层面不断向更高层次拓展。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当生存与安全需求得到基本满足后,人们便会更加关注生活质量与精神层面的提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长期高速增长显著改善了人民生活水平,但也使生态环境承受了较大压力。面对生态问题,相关学者明确提出:以有限资源追求环境、经济、社会效益协调统一,改善与维护生态系统,促进物质良性循环^③。近年来,我国在生态工程建设、生态脱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及生态观念传播等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但生态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仍然较为突出,在生态基础设施布局、生态文明体系的系统性构建,以及生态文化建设和相关人才培养等方面,仍然存在不同程度的短板。

作为一项系统性、综合性的治理工程,生态工程的实施效果不仅取决于制度设计和技术手段,也与社会公众的生态文化认知和价值观密切相关。只有在充分把握我国当前生态问题阶段性特征及其成因的基础上,生态工程建设才能取得更加稳固和可持续的成效。由此,回应人民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现实需求,推动生态工程持续健康发展,客观上要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条件下实现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创新发展。

2. 转变发展方式,树立绿色发展观

工业文明在为人类社会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加剧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当前,全球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异常气候所导致的自然危机频发,资源与能源供给日趋紧缺^④。国内社会,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国民收入与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但在此过程

① 魏书胜、曹靓:《马克思的“人类历史”观及其当代意义》,《学术交流》2024年第10期,第5-1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0页。

③ 刘宏伟、孔欣钰:《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的三重论域——基于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生态哲学思想》,《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4期,第14-25页。

④ 郁庆治:《新时代五年规划与绿色发展理念的制度化》,《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6年第1期,第36-45页。

中,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资源浪费与环境污染。部分地区的污染物排放已超出生态环境的自净能力,对人民生活产生不利影响;尚未彻底解决的供需不平衡问题,也有碍经济增长,加剧社会矛盾;生态退化及其衍生的环境效应更将严重威胁人类社会的长期发展。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人直接地是自然的存在物”,“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①,揭示了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人类社会的存续与发展离不开自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背景下,为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与人类社会发展的有机结合,需要倡导绿色发展观。从功能界定上讲,绿色发展观是第二代可持续发展观。^②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③中华优秀生态文化中蕴含的人与自然辩证统一思想,为绿色发展观的形成和实践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质言之,为适应新阶段生产实践,推动绿色发展观有效落地,客观上要求对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加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四、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价值导向与创新推进

(一)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文明目标: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与以资本逻辑和资源扩张为主导的西方现代化道路不同,中国式现代化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目标,将生态建设纳入现代化进程之中^④,强调在发展中保护生态、在保护中推进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统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⑤,无止境地向自然索取、破坏自然,必然遭到自然界的反噬。在现代化进程中,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根本要求。因此,中国式现代化不再以单一的经济增长指标作为绩效标准,而是强调在不断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同时,通过生态建设满足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在这一意义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仅是发展目标,更是一种具有价值引领意义的现代化形态。

(二)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文化价值导向:规范行为和转型升级

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使生态问题的性质和治理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也由此推动生态文化功能的转变。传统社会,中华生态文化主要以生活伦理和经验规范的形式存在,通过“顺应自然”“节用爱物”等传统生态思维,对个体行为发挥道德引导和价值约束作用。在长期历史演进中,这种以日常生活实践为基础的生态文化形态,在维系人与自然的基本平衡上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伴随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进程的加快,生态问题逐渐呈现出公共性、系统性和跨区域性特征,仅凭个体基于道德自觉和经验规范,已难以有效应对现实挑战。从经济学视角看,生态环境作为公共物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容易引发加勒特·哈丁所提出的“公地悲剧”问题。这表明,现代社会,生态问题已超越个体行为层面的选择,成为需要通过公共治理和制度安排加以回应的社会问题。

① 李玉峰:《习近平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略论》,《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5年第6期,第19-23页。

② 胡鞍钢、周绍杰:《绿色发展:功能界定、机制分析与发展战略》,《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年第1期,第14-20页。

③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第1版。

④ 禹湘:《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https://www.qstheory.cn/20260121/77051e9f65894703a0c26f687282a8af/c.html>, 2026年1月26日访问。

⑤ 李宏伟:《深入理解“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标识性概念与原创性贡献》, <http://qstheory.cn/20250310/42ad9d5d40144743ab0a4a5eeb8f91b2/c.html>, 2026年1月26日访问。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式现代化强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生态文化功能的拓展提供了现实条件。生态文化不再局限于道德引导层面,而是逐步参与到生态治理和发展方式转型之中;其作用也由侧重个体行为规范,转向为宏观层面的制度建设、政策实践和公共决策提供价值支撑。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了生态文化由生活伦理向公共治理的功能转型,使其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具备了更加现实且稳定的作用空间。

(三)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文化创新推进:实现生态文化与生态文明目标的适配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实现有效传承并发挥现实功能,关键在于通过创新发展,使其与现代化发展目标和实践条件相契合。

从价值上看,生态文化创新应当突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整体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天人合一”“万物一体”“道法自然”等思想,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所强调的“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在价值取向上具有内在一致性。通过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相结合,这些传统生态理念得以在当代语境中重新阐释,转化为引导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发展方式转型的重要价值基础。

从治理上看,生态文化创新需要顺应现代国家治理的现实要求。中国式现代化强调制度建设和公共治理^①,这要求生态文化在创新过程中注重与生态治理、绿色发展等制度政策的衔接,使生态理念由基于文化的道德引领,逐步转化为具有稳定约束力和广泛认同度的公共价值,推动生态文化在现实运行中发挥持久引导作用。

从发展上看,生态文化创新必须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目标,兼顾其世界意义。面对全球生态环境恶化等共同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②,强调“可持续发展是破解当前全球性问题的‘金钥匙’”^③。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文化创新,正是在这一宏大背景下,将中华传统生态智慧转化为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并为“美丽世界”贡献中国方案的重要思想支撑。

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态文化创新发展赋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进路

大部分国家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都曾面临生态问题,也在不同程度上遭遇了生态危机。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面临的生态危机可视为一种文化危机。因此,解决生态问题需要通过构建生态文化来探寻根本出路。中国悠久且灿烂的生态文化资源价值,在长期发展中尚未得以充分展示。当前,面对如何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课题,党中央明确提出生态文明发展模式需要与生态文化相结合。这要求以中华生态文明创新性发展的手段,进行多维度探索。

(一)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构建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发展体系

西方生态理念作为工业文明的产物,其现行的主流生态思想是“弱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现代化理论^④。该理论认为,生态环境恶化以及生态与经济的矛盾是暂时的,科技进步与工业革命的持

① 包心鉴:《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逻辑》, <https://www.qstheory.cn/20250822/f0dee4a58d7348c39347cfe59c646728/c.html>, 2026年1月26日访问。

② 《跟着总书记学习二十大报告 | 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55335875911121874&wfr=spider&for=pc>, 2026年1月20日访问。

③ 《习近平用这把“金钥匙”解锁当前全球性问题》, <https://www.12371.cn/2019/06/10/ARTI1560137922570330.shtml>, 2026年1月20日访问。

④ 何畏、于静雯:《“第三条道路”可能吗?——弱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成、演进及其限度》,《南京社会科学》2026年第1期,第30-37页。

续推进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强调不同主体的对话与互动。与此不同,中国生态思想源远流长,中国传统生态智慧尤其重视主体对自然的自觉保护,并将之内化为道德规范与社会责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向来尊重自然、热爱自然,绵延 5000 多年的中华文明孕育着丰富的生态文化。”^①几千年来,以“天人合一”为核心的中华生态文明观已融入民族血液,强调人与自然的内在统一与顺应关系,认为自然界万事万物皆遵循一定的客观规律,而人类社会的发展必须尊重并顺应这些规律。这与新时期我国经济建设和发展的理念高度契合。

中国式现代化在生态方面的核心主旨,既蕴含了中国传统“敬畏生命”“取用有节”“道法自然”的生态文化,又蕴含着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辩证统一关系的思考,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那么,在生态领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深化文化内涵,创新发展方式,构建具有中华文化特色的生态文明发展体系。具体而言,在精神上,要求人们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自然观和历史主义价值观,以绿色消费替代传统的消费理念和消费模式;在物质上,以划定生态空间保护红线、发展绿色低碳循环产业、打造绿色产业链、支持清洁能源开发、发展绿色金融等方式,推动绿色工业革命开展;在制度上,以在 2050 年实现“绿色现代化”为目标,把绿色发展理念上升到国家意识层面,再以上层建筑的形式表现出来,具体细分到各大行业与领域,以法律规章的手段巩固绿色成果。

(二)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为指引,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以下简称“两山”理念),对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内容和奋斗目标。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论是实践的指南。^② 因此,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以“两山”理念为指引,从多个方面培育科学的社会生态文明观,从而实现构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这一战略任务。第一,树立科学健康的生态伦理观。政府应通过宣传教育、政策措施等途径,引导民众深入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自觉摒弃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心主义,牢固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同时,充分发挥家庭、学校和社会的教育宣传作用,培育民众良好的生态环保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第二,秉持合理生态安全观。既推动产业结构向节能高效转变,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与环境承载力;也推动生产建设向绿色环保转变,降低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与此同时,推动农业发展向生态安全转变,走绿色、可持续发展之路。第三,树立正确的生态消费观。推崇适度消费、绿色消费与共享消费,构建科学的消费模式,实现国家宏观调控与居民消费水平的有机统一。第四,培育正确的生态价值观。为加快生态文明建设,需在全社会牢固树立“两山”理念,全面提升国民生态文化素养,营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良好氛围,为构建和谐社会与实现可持续发展奠定思想基础。

(三)以绿色经济为目标,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转型升级

“绿色经济”概念由英国环境经济学家皮尔斯于 1989 年提出,具体可分为绿色生产与绿色消费。目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已进入新常态,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环境,以及经济增速放缓、产业转型升级的国内局势,需要转变发展方式,构建以效率、和谐、持续为发展目标的绿色经济体系。

萨伊的“三驾马车”理论认为,投资、消费与出口共同构成 GDP 的增长引擎,发展绿色经济同样离不开三者的驱动作用。而自 20 世纪末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主要依靠投资与出口,消费的拉

① 张瑞才:《学习和阐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八个向度》,《思想战线》2021 年第 4 期,第 1-11 页。

② 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深学笃行习近平经济思想 以科学理论引领伟大实践》, https://www.ndrc.gov.cn/xwdt/ztl/NEW_srxxcgjipjjsx/jjsxyjqk/tgyg/202510/t20251011_1400898.html, 2026 年 1 月 26 日访问。

动作用相对被忽视,“三驾马车”结构存在失衡风险。由此,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更需兼顾生产与消费的平衡。从供给角度来看,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需要进行绿色生产,扩大绿色生产领域的投资,扶持绿色企业发展,打造完整绿色产业链,通过降低能源资源损耗、减少污染物排放、优化技术水平、促进废物循环利用等方式奠定绿色产品生产的基础。从需求角度来看,消费在中国社会经济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稳定器”与“压舱石”。当前,中国社会经济已基本步入“消费主导型”这一新阶段。^① 根据国民经济核算的支出法,“消费”是指最终消费支出,即居民消费支出和政府消费支出。其中,政府消费稳定且可控,居民消费存在巨大潜力。发挥消费的动力作用,关键在于释放居民消费潜能,需要以“适度”理念鼓励“减”与“加”相结合的新型绿色消费,建设环境友好型消费结构。

综合而言,绿色经济是生态文明建设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要求我们既要通过宏观经济政策激发大众消费潜能,又要推动对外贸易结构转变、优化出口模式,从生产与消费两个层面实现市场化和生态化有机结合。

(四)以制度创新为保障,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机制改革

良好的国家治理体制需要强有力的制度保障。环境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其治理效能直接关系生态文明制度的完善程度。为此,为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需要健全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这一硬约束,明确生态治理不可逾越的制度底线。

第一,应加快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针对当前我国国土空间开发中存在的无序问题,一方面,要完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构建土地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促进城乡、工农、生态系统等方面的空间布局优化;另一方面,要健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明晰责任划分,加强技术攻关,建立以土地用途管制为基础、以市(县)为主体、以行业为主线的分级管理的国土空间管制体系。第二,要不断完善生态保护红线监管体系。生态保护红线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健全和完善生态保护红线审批调整机制及相关配套制度。具体而言,明晰部门权责,加强信息共享,落实“多规合一”;同时,协调统一相关部门与环节,梳理相关制度的多重关系,保障各管理制度顺畅有序运行。第三,建立严格的生态环境损害修复和赔偿制度。既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程序和救济手段,填补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立法上的空白,从源头上解决因公权损害引发的纠纷问题;也加强生态环境修复,严格遵循“谁损害、谁负责”的原则,对受损生态环境及时开展协商修复。第四,落实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制度。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牢固树立“绿色政绩观”,注重发挥外部监督考核与内部自觉践行的双向促进作用,加快形成科学完善的领导干部政绩考核评价机制,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五)以科技创新为动力,实施生态文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面对经济社会发展动力不足的挑战,必须坚定不移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② 在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过程中,除了要继承和发展优秀传统生态文化,还必须依靠科技进步为生态事业注入新的活力,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的绿色创新发展之路。

加强生态科技创新,需要从内部技术研发、外部环境营造以及科技人才培养等多个维度协同推进。第一,加大环境友好型技术研发投入。积极设立多种类型的环保研发基金,这些研发基金,一

^① 张磊、王霜、王越:《中国式消费现代化的基本特征、现实矛盾和提升路径——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考察》,《经济学家》2026年第2期,第45-54页。

^② 辛宇:《支持全面创新基础制度的战略意涵、核心构件与实践方略》,《学习论坛》2026年第2期,第62-70页。

部分可用于组建国家生态技术实验室,关注国家战略需求,以项目立项的形式不断加强生态环保技术基础研究。另一部分可用于完善生态技术研发体系建设,构建以高校和企业为创新主体,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政企结合为手段的绿色技术创新机制。第二,营造良好的生态科技创新环境。在培育社会创新文化,鼓励万众创新,打破发达国家生态和技术壁垒的同时,构建多层次的生态产品供给体系,为生态技术创新营造一个合作共赢、覆盖面广的良好市场环境。第三,持续加大生态科技人才培养力度。要不断优化生态科技人才的发展环境,制定并实施生态科技人才培养的长远规划,加强人才管理与服务工作,将人口压力有效转化为人才优势,为社会主义生态事业繁荣发展提供动力支撑。

(六)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引领,深化生态文明建设国际合作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深刻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各方面守望相助的精神。生态环境作为全球公共资源,事关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为应对当前全球面临的生态环境危机与可持续发展挑战,需要共同探索一条全球范围内的生态文明发展道路。

第一,扩大中华生态文化的国际交流。应立足“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背景,在国际经济合作中不断传播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生态价值观,积极倡导“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生态理念,为世界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与智慧经验。第二,积极推介国际生态文化的优秀成果。生态保护不能固步自封,需要借鉴其他国家生态治理的积极经验,吸收世界生态治理的优秀成果。可在联合国的全球行动理念和原则指导下,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树立全球生态合作治理的新理念,共同推动全球绿色发展。第三,开展全方位的国际性生态合作。中国始终是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要坚持以科技创新为支撑,走共享、可持续的绿色发展道路,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深层次上履行国际责任,引领全球生态科技发展潮流,不断推动完善全球生态治理机制,为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六、结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在长期文明演进与历史实践中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其所蕴含的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质朴理念,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根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有必要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出发,深化生态文化价值理念,立足现实发展需求,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加快构建具有中华文化特色的生态文明发展体系,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稳定持久的价值引领与精神支撑。同时,要不断深化生态文化理念,完善生态文明理论体系,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

Innovation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Ecological Culture and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ZHANG Youlin¹, TIAN Qiming²

(1. *Institute of Global Urban Civilization, Souther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enzhen 518055, China;*

2. *Department of Economic History,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London WC2A 2AE, UK*)

Abstract: Formed over the long course of development, Chinese ecological wisdom and cultural traditions provide a deep cultural roo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Guided by Xi Jinping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is article traces the histo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ecological culture by discriminating and clarifying the connotation and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ecological culture, and divides traditional Chinese ecological culture into five basic types: agricultural ecological culture, grassland ecological culture, folk ecological culture, religious ecological culture, and ethnic minority ecological culture.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China's sustainabl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further explores the practical pathways through which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ecological culture can empower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ecological and philosophical principles implied in traditional Chinese ecological culture, such as respect for nature, harmony with natur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re still valuable in the contemporary society. Therefore, promoting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ecological culture and improving ecological cultural value systems are of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ortance for advancing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Key words: ecological cultur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raditional ecological culture; ecological cultural innovati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责任编辑:魏 霄)